



亚洲艺术、宗教
与历史研究丛书

同文书史

——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

王鑫磊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教委“晨光学者”计划项目
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复旦大学“卓学计划”项目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985二期”项目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



亚洲艺术、宗教
与历史研究丛书

同文书史

——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

王鑫磊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王鑫磊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2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189-7

I. 同… II. 王… III. 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2173 号



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

王鑫磊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40 千

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189-7/K · 521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有关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尤其鼓励跨越艺术、宗教与历史多领域进行综合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

二,本丛书收录有整体结构与完整内容的中文学术著作,同时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但不接收论文集。

三,本丛书所收专著,应当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具有现代学术著作的形式。注释采取页下注,书后需附“参考文献目录”,如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则更为欢迎。

四,本丛书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辑的学术丛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负责邀请匿名审稿人,对收入本丛书的著作进行评审。

五,本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2013年9月

序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因为有甲骨文字、秦汉简牍、敦煌遗书以及明清档案四大史料的发现而呈现出异彩,成为学界所津津乐道之大事。其实对东亚诸国汉文资料的发掘的重要性现在看来实在不亚于上述的四大发现,其中尤其是对朝鲜汉文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呈现出最突出的成果。先是对李朝朝鲜实录的利用,而后是对朝天录与燕行录的编辑出版,接着是对大量朝鲜文人文集的整理与编辑,以及对朝鲜赴日通信使的纪录的注意,累积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渊薮。自 20 世纪末以来,到 21 世纪,朝鲜、日本与中国都有许多学者利用相关的史料做出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就是这一系列成果的最新一种。

本书作者王鑫磊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期间,原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但是,自从加盟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来,由于对葛兆光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向产生浓厚兴趣,因而开始阅读韩国有关文献,并把他原来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知识与这些相关文献结合起来,开始进行“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的系列研究。在这几年里,他多次出访韩国,并且学习了韩语,还以较长时间赴韩国首尔大学收集资料。他原本拥有的近现代历史知识,给他进入“韩国汉文文献”这一新领域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向。

近世东亚的历史,以及东亚诸国,由于以汉文写就的朝鲜文献、日本文献、越南文献以及琉球文献的大量存在,完全可以作深入和丰

富的研究,特别是长期以来东亚诸国之间的互相接触与彼此观察,更是值得深入讨论的新领域。但是,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算是起步不久,尽管这一类文献的重要性,八十年前已经有学者指出,但是至今依然不能说已经充分利用,特别是如朝鲜燕行文献之外的各种李朝朝鲜史书、官方文献、私人文集与笔记以及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日本长崎的大量通商与交往档案,日本士人对明清的种种记录、各国文化人之间的笔谈、唱酬,甚至绘画等,还大有开发的空间,还需要广泛深入的使用。王鑫磊博士近几年来从头参与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计划,对这方面文献有广泛接触,自然为此书之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包括六个部分,在绪论之外有正文五章,涉及的时段从明代到清末,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了中韩儒学争论、日韩文化竞赛与认同、东亚海上交流、各国的近代转型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一章有关明代后期中韩士人有关儒家思想的争论部分中,无论是许篈有关阳明学的言论,还是有关薛瑄从祀的看法,一方面既表明在中韩共同拥有的儒家知识领域,两国知识人已经存在分歧,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皮相地认为个别的分歧就说明中韩儒学后来渐行渐远的分裂。因为即使在中国,在许篈访问的当时,虽然阳明学风头甚劲,但仍然有不少朱子学的拥趸者。而且阳明学逐渐传播到李朝朝鲜后,连许篈的弟弟许筠以及朝鲜国王也对阳明学取同情态度。因此王鑫磊以“儒学并非铁板一块”的说法来解释此时朱子学与阳明学消长情况,表现出一种审慎的学术风格。

而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超越中朝双边的畛域,更透过日本与朝鲜的眼睛反观中国、或者通过一个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安南之行,来观察东亚的关系,这种“文化接触”或“第三只眼”的讨论相当重要。这是文化间接接触的典型事例,值得研究者予以重视。第六章则是讨论面对西潮的朝鲜、日本和中国,王鑫磊通过《江华条约》与日本冲击下朝鲜的反应、朝鲜使团在日本的游历和观察,朝鲜使臣在中国天津的学习和交流,讨论了东亚近代转型过程中,朝鲜、日本与中国的

种种反应,展开了多视角的历史场面,这是过去研究者较少留意的全景画。

这部书借用了“书同文”一词改作书名,一方面固然是说,同样使用汉字书写,不仅使东亚诸国构成了一个文化区域,也使得这些汉文文献呈现了一个共同历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说,使用同一种“汉文”书写的历史下面,也有仅仅依赖文字无法弥合的文化差异,虽然汉文书写,呈现出一个历史,但是一个历史下面却有种种不同认识和解释。当然,东亚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相当复杂,它并不开始于西潮冲击之后现代进程的差异,甚至开始于各国自我中心的自尊意识,这当中朝鲜与日本的情况还有些不同,日本因为从未成为中国的附属,从来就有相当程度的自尊意识。因此,通过这些汉文书写的历史资料,也许我们可以超越中国史的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看这一“汉文”呈现的历史世界。

当然,有史料并不等于有史实,如何从史料中还原出真正的史实来,并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这是对每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的考验。至于史料只看到部分,就企图做出宏大的解释,或确立自己的理论,恐怕并不是可取的态度。王鑫磊此书正让我们看出他对历史研究的敬畏态度,对处理史料的审慎精神。此外,从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绪论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王鑫磊是如何在拥有与理解大量朝鲜汉文史料的知识基础上才写成这部书的。由于这篇比寻常著作偏长的绪论的存在,又使得这部书成为一部具有指南性质的著作。我向来不善于写序,承作者美意与葛兆光先生的推动,就将上述的话作为我的读后感吧。



目 录

绪论	1
引言：“书同文”的东亚与“汉字文化圈”	1
一 同文书史：“书同文”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	7
二 异域之眼：周边国家汉文文献整理和研究现状	12
三 以邻为镜：朝鲜半岛汉文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	22
四 本书旨趣：东亚互动视野下的近世中国	46
附 韩国文献资料数据库网站简介	48
附表一 “古典翻译丛书数据库”所收书目一览	57
 第一章 儒学交涉：16 世纪中后期朝鲜人眼中的中国学术	62
引言	62
第一节 许筠及其《朝天记》简介	63
第二节 阳明异端：许筠与中国士人的学术论争	67
第三节 足征难循：朝鲜王朝对明朝薛瑄从祀的反应	86
小结	100
 第二章 中华名分：从卢以渐《随槎录》看朝鲜的小中华意识	105
引言	105
第一节 《热河日记》姊妹篇：卢以渐及其《随槎录》简介	107
第二节 《随槎录》所见史料举要	110

第三节 万里他国无事往还：“排清”士人卢以渐眼中的中国之行	118
第四节 尊周思明、北学思想与小中华意识	122
小结	126
 第三章 文化比赛：在朝鲜和日本之间寻找“中国”	127
引言	127
第一节 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概说、文献及问题	128
第二节 通信使文献中有关中国材料举例	132
第三节 个案研究一：申维瀚《海游录》浅探	135
第四节 个案研究二：洪景海《随槎日记》浅探	142
第五节 批评与回应：朝、日文化比赛的一个侧面	150
小结	173
附 朝鲜王朝遣使日本大事记	175
附表一 朝鲜王朝时期赴日使行情况一览表	183
附表二 通信使文献馆藏信息	187
附表三 《海行总裁》国译本收录文献目录	190
 第四章 远邻安南：17 世纪滞日朝鲜人赵完璧的安南之行	192
引言	192
第一节 赵完璧事件的历史文献、流传背景及相关研究	193
第二节 从日本到越南：赵完璧的安南渡航经历	198
第三节 朝鲜的越南认知：赵完璧安南见闻的意义	206
第四节 关于吕宋、琉球和日本的记载	213
小结	215
附一 李晔光《赵完璧传》	219
附二 郑士信《赵完璧传》	222
附三 李埈《记赵完璧见闻》	223
附四 《昼永编》载济州岛民漂着安南事件	224

第五章 现代转型：19 世纪末朝鲜对中日两国的观察	228
引言	228
第一节 “绅士游览团”及“领选使”概说	231
第二节 绅士游览团：朝鲜赴日使节对日本现代化场景的 观察	238
第三节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金允植天津领选研究	247
小结	264
余论 从东亚观察中国 由中国理解东亚	267
参考文献目录	271
后记	286

绪 论

引言：“书同文”的东亚与“汉字文化圈”

中国、朝鲜半岛（包括今韩国及朝鲜）、越南、日本等一些属于广义上的“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将汉字作为主要的书写记录文字，这一现象被称为“书同文”，也有人喜欢用“汉字文化圈”的概念来进行表述。

“书同文”是对一种客观历史现象的概括性表述，它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都产生并留存下来大量用汉字书写的文献，且这些存世文献几乎涵盖所有书籍类型，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史籍，特别是官修国史类的书籍，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历代文人的作品，其涵盖范畴很广，包括有学术著作、诗文集、日记乃至小说等类型的书籍。

举例来说，在史籍方面，如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日本的《日本书纪》、《大日本史》，琉球的《中山世鉴》、《历代宝案》等等，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国史记录类文献，而其中绝大多数作品，不仅全部用汉字写成，甚至连编撰体例依照的都是中国传统史书的编年体或实录体的方法。国史类文献是保留和延续一个国家的国家记忆的最核心文献，共同用汉字书写此类文献的事实，可算是历史上东亚“书同文”现象最具代表性的表现。

相对于史籍而言,数量更为庞大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历代文人所创作的作品。文人群体,或者说士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正是维持东亚“书同文”现象长期存在的中坚力量。以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士人为例,他们几乎和中国的士人一样,自幼便系统地学习汉字,更为关键的是,近世以来,对汉字和汉文的掌握成为令他们身份地位高于普通民众的一种阶层标识,也是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掌控国家政治权力的根本前提,他们坚持用汉字写作和进行阶层内部的思想交流,实际上也成为了维系和巩固本阶层社会地位的手段,作为其结果,朝鲜半岛和越南历史上均留下大批量的用汉字写作的文人作品。

除了大量存世汉文书籍和文献为东亚“书同文”现象的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外,各类文献中所见关于东亚各国及地区间人员往来交流的历史事实,也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幕幕“书同文”的场景。因为有了汉字作为通用文字,历史上东亚各国之间的国际交往中几乎没有太多的障碍,即使口头上无法顺畅沟通,但交往中的各方完全可以通过“笔谈”(即用书写汉字进行交流)的方式达到彼此间的充分理解。

历史上东亚各国间的人员往来和交流十分频繁。比如朝鲜、越南向中国的朝贡使行是中、朝、越三国之间重要的交流通道,而朝鲜派往日本的通信使、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遣唐、遣明使等活动,则又是朝日、日中间沟通的渠道。此外,更多的人员交往还发生在东亚区域内通过海陆两种途径展开的商贸活动,以及以东亚海域为中心频繁发生在中、朝、日、越等国间的漂流民事件等过程中。经由这些活动,东亚各国人员间产生大量交集,而在这些交流过程中同样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下来,从其中诸如诗歌酬唱、笔谈记录等内容,可以看出他们以利用汉字汉文进行交流的不争事实。

16世纪末,朝鲜使臣李睟光和越南使臣冯克宽分别代表各自国家出使中国,他们在北京见面并进行了交流,虽然听不懂彼此口中说出的话,但他们通过笔谈和互赠诗歌的方式结为知己,成就了一段跨国文化交流的佳话。在他们互赠的诗歌中有这样的诗句:“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李睟光)、“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

贤书”(冯克宽),两人的诗句不约而同地指向“书同文”的现象,可以说是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书同文”的时代的真实写照^①。

“书同文”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随着研究的展开,相关讨论也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意义阐释和价值判断的层面,“汉字文化圈”概念应运而生。关于“汉字文化圈”的提出,最早大概应该追溯到日本学界^②,而中国学者显然对这一概念有着更大的兴趣,且颇有推波助澜之势。可是,“书同文”是一种客观现象,而“汉字文化圈”则是一个基于现象进行意义和价值提升的理论概括,两者之间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学者在研究“汉字文化圈”的问题时,会有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问题意识和论述重点,“汉字文化圈”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有其固有的价值。可是一旦脱离具体的研究对象,只是泛泛地就概念来理解,认为用“汉字”这个要素,就能以文化的名义在东亚简单地画出一个“圈”来,就或多或少会出问题。这背后涉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东亚到底有没有一个文化的认同。

东亚到底有没有文化认同?对于这个问题,用求同法可以找到大量肯定的依据,而用求异法又同样能够找到不少反对的理由,求同存异之后,可以认为这种文化认同一度存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① 李晔光、冯克宽两人的诗句,收在李晔光《芝峰集》卷八之“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见[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六十六册,第85页;亦收在冯克宽《使华手泽诗集》和《梅岭使华手泽诗集》中,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册,第65—66页及第98—100页。

② 冯天瑜教授在其《汉字文化圈刍议》一文中提到:1963日本平凡社出版的河野六郎执笔的《日本語の历史》多次出现“汉字文化圈”这一短语,其第三章更是专门讨论“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及演变。日本语言学家藤堂明保1971在光生馆出版的《汉字とその文化圈》,系统阐述“汉字文化圈”的内涵,探讨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及发展历史,对这个概念予以学术界定。参见冯天瑜《“汉字文化圈”刍议》,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第2页。此外,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论述“东亚世界”是“一个历史的文化圈”时,归纳出“东亚世界”的四要素,即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其观点被不少学者在讨论“汉字文化圈”问题时所征引。西嶋定生的观点,可参见其《东亚世界的形成》,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88—92页。

淡化、瓦解^①。

回到“汉字文化圈”的问题上来，虽然汉字的使用一直被作为东亚世界的“同”的因素来强调，但即使是在这个“同”的背后，还是存在不少“异”的因素。

首先，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在大量使用汉字的时候，也同时拥有自己的文字，如朝鲜在15世纪中叶就出现了韩字（一般以1446年朝鲜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为标志），越南的喃字（或称字喃）也至少在13世纪就已经形成体系，而日本则早在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假名（同时使用假名和汉字字形进行书写，且汉字字形均可用假名拼写，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文字体系，也称“和文字”）。所以，至少到了15世纪以后，中国以外的这些东亚主要国家都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体系，汉字并不是唯一被他们使用的文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自生文字的使用情况如何，尤其是与汉字相比较的使用率如何。

学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般都认为朝鲜、越南和日本自己的文字，自其出现之后，一直都处于不那么重要的地位，只是通行于民间或者非正式的场合，无法撼动汉字作为官方记录文字的地位^②。当我们认为汉字是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的所谓官方文字或者占主导地位的文字时，多少还是受到通过存世文献来认识历史的观念局限，单以不同文字书写的存世文献的数量多少，或者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士人阶层的单方面叙述而得出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适当地

① 葛兆光教授在其《宅兹中国》一书中指出：如果说“东亚”真的存在过认同，也恐怕只是17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这种以汉唐中华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从17世纪以后开始瓦解。参见葛兆光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12页。

② 张伯伟教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一书中提到：汉字在汉文化圈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尽管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其本国文字，但其往往通行于民间或女性。朝鲜时代人将本国文字称作“方言”，将国文诗歌称作“俚语”或“俗讴”，用日语写作的和歌、物语被男性贵族轻视为“女文字”或“女流文学”，日语也受到朝鲜时代知识人的轻视，而汉文学则保持了正大的和正统的地位。因此，在20世纪以前，汉文化区中在正规场合使用的正统文字都是汉字，也因此而遗留下大量的汉文文献。参见张伯伟著《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将目光下移,比如用社会史或者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去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或文献记录以外的历史,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以朝鲜半岛为例,世宗时期发明的韩字是一套纯粹的表音文字系统,它直接和朝鲜语的发音挂钩,只要掌握有限的符号和发音的对应关系,就可以实现读写,其极易习得的特性,成为其为下层民众广泛掌握和使用的根本原因。在近世朝鲜半岛历史上,“不识字(汉字)”的下层民众广泛掌握和使用着韩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国家下发到基层的告示和文书等,最后出现在民众眼前时必然会有一个韩字的版本以利其理解;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类书籍,因为有面向大众的需要,大部分同时有汉字和韩字两个版本,还有些更是直接用韩字创作。由此可见,在民众间的互动、国家与基层的联动、上层文化向底层的流动等等这些过程中,韩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大概也只有在认为一个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并不构成其历史主流的逻辑前提下,我们才能不加限定地将汉字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地位轻易置于韩字之上。朝鲜半岛的情况如此,越南、日本或多或少也有些类似之处。对这些国家自生文字的使用情况及其影响的重新认识和评估,将有可能令我们对历史上汉字在东亚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所谓“汉字文化圈”的界定有新的认知。

其次,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各自在对汉字的使用和重视程度上是存在差异的。相比之下,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情况比较接近,由于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时间更长,程度也更深,加之与国家政治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士人阶层的稳定存在、维系社会结构相对稳固的科举制度的长期运作等原因,使得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汉字”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被赋予了“正统”的地位,即一种难以撼动的政治和权力属性。与对汉字重视程度的近似相对应的,是朝鲜和越南士人的汉文水平的不相上下,而两国文士相见时往往总会生出相逢恨晚、惺惺相惜、引为异域知己的感觉,大体亦缘于此。

然而,日本的情况与朝鲜半岛和越南是不同的。近世以来,日本世袭社会的属性相对明显,并没有如朝鲜和越南那样出现士人阶层

主导政治权力的情况，也没有科举制度的存在，这使得汉字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在日本历史上，掌握汉字、汉文的人群更像是一个技术群体或者说学术群体，比如极具代表性的“五山禅僧”。此外，有一些文人、官僚和贵族也积极学习和使用汉字，其目的大概不外乎学术研究、国际交往中的应用，或是为了彰显自己文化水准等。总的来说，汉字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在日本并没有“正统”的政治性意味，也没有一整个社会阶层的人必须要靠它吃饭，它不过是一门学问和技术。因此，比之朝鲜和越南，近世日本以纯汉字书写的文献要少得多。而当我们看到历史上朝鲜文人常常对日本文人的汉文水平嗤之以鼻、日本商人去越南做生意要带个朝鲜人做翻译这样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各自独有的自生文字的存在及影响，以及它们对汉字的使用和重视程度的不同，这些情况都在提醒我们，对“汉字文化圈”的内部差异性问题的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类似“汉字文化圈”这样一种对同一性的概括，最大的危险性就在于有意无意之中对差异性的消弭^①，而差异性中恰恰可能反映着最真实的历史。因此，从“汉字文化圈”的理论框架中跳出来，回到“书同文”这一客观现象，将注意力集中于东亚各国所留存的汉字文献本身及其反映的历史事实，而不要过分追求“文化共性”、“东亚认同”之类的价值论断，或许才真正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对于“书同文”和“汉字文化圈”，似乎都不应过于执着于理论的建构，而应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或者研究的方法来加以对待^②。

① 正如葛兆光教授在讨论“亚洲”与“中国”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的时候，它会不会在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淡化了中国、日本、朝鲜的差异性呢？从中国历史研究者立场看，如果过于强调“从亚洲出发思考”，会不会在“亚洲”中淡化了“中国”呢？参见葛兆光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14页。

② 张伯伟教授在其《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一书导言中着重强调了东亚汉文文献作为研究东亚历史问题的整体性文献的价值，其观点颇有启发性。他指出：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整体，就不仅是学术研究中必需的材料，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转下页）

一 同文书史：“书同文”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

东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保留下大量用汉字书写的文献资料,这是东亚“书同文”的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从微观的角度看,这些文献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自身历史的记录,而就宏观的视角而言,所有的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又有着大家共用汉字记录整个东亚世界历史的意味。不仅如此,这种微观和宏观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叠加组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的状态,从任何一方的记录中都可以发现与另外几方相关的内容。因此,所谓“同文书史”的义涵,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大家都用汉字记录历史,二是大家一起用汉字记录东亚共同的历史。

“同文书史”的情况,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首先,每个国家都有了从外部寻找有关自身的历史记载的途径。其次,大家都可以在一个更加宏大的东亚视野下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文化定位。当然,因为所有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所以对目前仍以汉字为母语的中国学者而言,阅读的优势显然更为明显,上述的意义也更为直接。具体来说,中国学者利用域外汉文文献开展研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研究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历史具有文献利用的先天优势。这一点不难理解,比如对于中国从事朝鲜半岛历史、越南历史、日本历史这样一些外国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他们在文献资料的阅读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障碍,甚至可能比这些国家的本国学者更具有优势。不过,话又说回来,治外国史仅依靠文献往往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受

(接上页)学术增长点或学术新领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而以汉文化圈这种研究方法为研究方法的具体实施,就是要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圈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参见张伯伟著《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第6—9页。